

古文献整理 与古汉语研究

吴金华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商订八题

“所到之处”句式源流考

《后汉纪》校议

《三国志辞典》商兑

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

吴金华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吴金华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10

ISBN 7-80643-657-X

I. 古... II. 吴... III. ①古文献学—文集②汉语—古代—文集 IV. ①G256.1-53②H1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299 号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

著 者 吴金华 著

责任编辑 王华宝 陈晓清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657-X/K·196

定 价 18.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一直是我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主要课题。以前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三国志校诂》(1990),《世说新语考释》(1995 修订本),《古文献研究丛稿》(1995),《三国志丛考》(2000),尽管内容不同,但主题是一样的。这个小册子作为新世纪之初出版的文集,实际上是《丛稿》与《丛考》的续编,因为一时想不出合适的书名,就在书稿上标目为《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一集》;后来想到第二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集出版,于是删去“第一集”三字,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文化荒芜的时代刚刚结束,在导师徐鸣谦(复)先生指导下,我进入了训诂学、校勘学的研究领域。徐先生说,训诂的重点是解析古书疑义,训诂的生命在于发明,即不断发现问题、不断破译难题,将古汉语的研究推向纵深;校勘的目的是扫除文本讹误,浩如烟海的古书积误是永远扫不完的,积累校勘的经验,丰富校勘的方法,这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历久弥新的课题。训诂与校勘虽然是两种学问,但这两种学问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学问必须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在谈到研究方法时,先生说,科研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不应当厚古薄今,也不必喜新厌旧,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攻坚式的学术研究中,只有能够不断发现问题并且能够大规模解决难题的方法才是有效方法。如今,当我

编完这本内容单薄的小册子的时候,我深感自己对有效方法运用得很不充分。不过,我愿意向这个方面继续努力。

在收入本集的二十篇文章中,有如下三种情况须作说明:(一)有的文章发表时因篇幅稍长而有所删节,例如《〈汉语大词典〉商订八题》曾按照刊物编辑部的建议删略为《五题》,《“所到之处”句式源流考》发表时删略了引言和结语等内容,现在均恢复了旧稿的原貌。(二)有些文章发表时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疏漏,其中以文字讹误居多,这次借结集的机会作了一些修补。(三)有四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朋友的协助或合作,这些文章发表时,我们曾共同署名于篇首,然而在本集里,只能按照编辑体例将合作者或协助者括注于篇末。

本集的出版,得到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吴金华

2000年11月

于复旦凉城区舍

目 录

序 言.....	1
《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献考察的若干问题.....	1
《汉语大词典》商补	10
《汉语大词典》商订八题	24
略论汪维懋《汉语重言词词典》	37
“所到之处”句式源流考	46
《后汉纪》校笺	59
《后汉纪》校读琐记	68
《后汉纪》校读琐记(续)	78
《后汉纪》校议	82
《后汉书》标点献疑(上)	92
《后汉书》标点献疑(下)	97
《晋书》点校献疑.....	103
《晋书》辨疑.....	107
《宋书》校点本偶记.....	115
《宋书》点校本志疑.....	123
《建康实录》校议.....	129

《三国志》四字格成语散记·····	140
《三国志》语词笺释·····	147
《三国志辞典》商兑·····	187
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	208

《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献 考察的若干问题

中国汉民族语言文字所记载的文献,经过三千多年的历史积累,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从中搜集资料而编成的《汉语大词典》(下称《大词典》),规模空前,内涵丰富,代表了二十世纪历史性语文辞书的最高编纂水平。由于《大词典》引用的古今文献面广量大,编纂者考察有关文献的工作头绪复杂,因而在若干问题上难免有一些疏误。如同所有的大型辞书一样,刮垢磨光不断完善,是修订者的长期任务。就修订工作而言,问题无论大小,大至立目或释义之误,小至句读或文字之讹,都应当认真对待。早在三十年前,世界著名的词典学家拉·兹古斯塔曾经指出:“通常人们并不会把词典从第一页读到最末一页,而是查阅单个词条。因此,每条词条可以说都必须自给自足,而不要指望使用词典的人在查阅该词条之前,会对词典学的总的问题有太多的思考。”^[1]这就是说,由于辞书不是供人通读而是备人查阅,所以每一个词条都必须自我完善;对于读者和修订者来说,任何一点欠缺都是不应当存在的,尽管那些欠缺与整体贡献相比只不过是白璧微瑕。本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杂陈己见,希望能供读者和修订者参考。文中引用《大词典》的词条,或者全引,或有省略,视讨论的需要而定;引文的后面,用括号标出《大词典》的卷数、页码,以便覆按。

一、因未查原始资料而误定作者的时代

从文献中取材并确定其产生时代,是历史性语文辞典的基础工作。对第一手资料进行考察,可用则用之,可疑则存之,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大词典》主编曾一再告诫:“没有原始资料或者缺乏原始资料,只凭现成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抄来抄去,最容易以讹传讹,损害词典的质量,而且养成一种想当然、不踏实和说空话的不良学风,这是非常有害的。”^[2]但是,上述“想当然”的现象仍不止一见。例如:

[沈畿] 三国吴王叡《将略论》:“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5卷1007页)

三国文献中,哪里能找到《将略论》呢?《后汉书·刘表传》记载的王叡,早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就死于孙坚之手,当时诸葛亮才十一二岁;所谓“孔明创蜀”云云,决不会出自汉末人王叡的笔下。如果查一查原始资料,总可以发现作《将略论》的王叡是唐代人。今核对《全唐文》卷七二五、《文苑英华》卷七四二的有关文字,还发现这里的“二三策”是“三二策”的误倒,这也是不查第一手资料的结果。

二、因不察异书同名而误定作者的姓名

书名相同而作者不同,其中内容也不相同,这是古书中常见的异书同名现象。要给所引的古书标明作者,不考查有关目录与内容,就可能张冠李戴。例如:

[成戒] 《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车驾临江而还”裴松之注引北齐魏收《魏书》:“三世为将……古有成戒。”(5卷196页)

裴松之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完成的《三国志注》中,岂能预先引用魏收撰成于北齐天保五年(554)的《魏书》?实际上,考察有关目录就可以知道《魏书》有三种:一是晋陈寿《三国志》中的子目,即《魏书》三十卷,通常又称《魏志》;二是晋王沈《魏书》四十八卷,《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今有辑本;三是魏收《魏书》一百三十卷。裴松之所引的,从内容上考察,只能是第二种。又如:

[箭在弦上] 语出《太平御览》卷五九七引北齐魏收《魏书》:“陈琳作檄……太祖爱其才,不咎。”(8卷1214页)

《太平御览》并没有标明《魏书》的作者,这里又一次“想当然”地把王沈的著作记在魏收名下。

三、因不察文献的性质而误加作者姓名

有些文献,作者不具名而注者甚多,引用时稍不小心也会以乙为甲:

[溱鸿] 三国魏宋均《春秋命历序》:“溱鸿萌兆,浑浑混混。”(6卷160页)

西汉末年开始流行的谶纬,除了把作者假托为“孔子”之类,真正的炮制者从不具名。《春秋命历序》作为谶纬书的一种,也没有具体可指的作者。参考《后汉书·杨厚传》李贤注、《初学记》卷九“总叙帝王”所引的资料,可知宋均是此书的注家。这里将注家当成作者,跟不了解谶书的性质有关。

四、失考于文献时代以致书证失序

书证的排列,以所引文献的时代先后为序,使一系列书证呈现

出历史解释性特点。《大词典》中有书证失序的现象。例如：

[礼意] ①礼经的意义。《书·周官》“冢宰掌邦治”唐孔颖达疏：“此经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礼》为之揔目，或据礼文，或取礼意，虽言有小异，义皆不殊。”《庄子·大宗师》：“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哭，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7卷963页)

《尚书》孔颖达疏晚于《庄子》，《庄子》应列为第一书证。这里之所以次序颠倒，大概是误将孔疏视为《尚书》了。第一书证显示该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最早时代，在历史性辞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又如：

[使命] 使者所奉的命令。《北齐书·魏收传》：“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1卷1328页)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最初出现在南朝陈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里，旧说系汉末作品，但近现代学者认为是东晋时代写定的。即便把此诗的写定时代推迟到齐、梁，^[3]也早于《北齐书》的成书时代。无论如何，唐代李百药撰写的《北齐书》只能列为第二书证。

五、失检于异书同文以致书证时代偏晚

时代不同的文献，有时包含着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一段文字，如《资治通鉴》之于《战国策》、《史记》，《南史》之于《宋书》、《南齐书》，等等，这就是异书同文现象。《大词典》中有许多条目书证失序，^[4]尤其是第一书证时代偏晚，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处理好异书同文的选择工作。例如：

[显讼] 《资治通鉴·汉成帝绥和元年》：“刘向自见得信

于上,故常显谥宗室……”(12卷373页)

《资治通鉴》的这段文字,来自《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刘向传。弃前者而取后者,足以显示“显谥”一词在汉代已经出现。又如:

[纂解] 明陈继儒《读书镜》卷九:“[徐庶]少好任侠击剑……而其党伍共纂解之得脱。”(8卷1229页)

包含“纂解”一词的这段文字,跟三国魏鱼豢《魏略》基本相同,实际上正是引自《魏略》。这里用明代文献为书证,未能反映出该词的悠久历史。

六、句读有误以致书证费解

有些书证很难读,是因为不明语词用法而造成了句读失误。例如:

[荆] ②通“形”。《隶释·汉楚相孙叔敖碑》:“念独吾死可,空复令他人见之死,为因埋掩其荆。”(2卷602页)

孙叔敖见到两头蛇,以为见到这种蛇的人非死不可,就把它打死并且埋掉了。所谓“空复令他人见之死为”,犹言何必让别人见到它而白白地死去呢?“空……为”是后汉流行的语法格式,如《后汉书·臧洪传》载袁绍对陈容说:“汝非臧洪畴,空复尔为?”《大词典》把语气词“为”割属下句,上、下两句都变得似通非通了。

也有不明历史事实而出现句读之误的。例如:

[纳受] 《三国志·蜀志·许靖传》:“不然,当复相介绍于益州,兄弟使相纳受。”(9卷760页)

“兄弟”当属上,否则上、下两句都不知所云。《蜀志·许靖传》载许靖与曹公书,前文说“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彦,深相分托于益州兄弟”,接着又说“当复相介绍于益州兄弟”,其中“益州兄弟”指益

踞在益州的刘璋、刘瑁。

七、句读不一以致书证可疑

《大词典》中又有因句读不同而产生不同条目的情况,使读者无所适从。例如:

[滂沱] ②形容泪或血等流得多……《三国志·蜀志·蒋琬传》:“夜梦一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意甚恶之。”(6卷35页)

[牛头] 佛教指地狱中的牛头鬼卒。《三国志·蜀志·蒋琬传》:“琬见推之后,夜梦一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意甚恶之。”(6卷235页)

到底是“一牛”,还是“一牛头”?两个条目同用一条书证,却使用了不同的句读。^[5]毫无疑问,这种不能并存的矛盾现象是不该出现的。

八、因解读之误而生假目

从文献中截取不成其为单词或短语的部分作为词目,就出现了假目。假目是在误解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条目没有存在的价值。例如:

[党战] 连续战斗。《周书·独孤信传》:“荣以信为前驱,与颢党战于河北,破之。”(12卷1369页)

“党战”是不是词语?“党”可不可以解读为“连续”?凭着《周书》的几句无头之文,令人难以置信。好在这段史事又见于《北史·独孤信传》:“后以破元颢党,赐爵受德县侯,迁武卫将军。”显而易见,《周书》的“颢党”即元颢的党羽。“党战”纯属假目,应当取消。又如:

[无出头] 谓无法摆脱困境。《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勳大破败”裴松之注引汉王粲《英雄记》：“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7卷107页）

这是吕布对战败者袁术加以嘲讽的一段话，“南”后的逗号应当跟“间”后的分号互换。所谓“一时之间……无出头者”，意思是说：转眼之间，你就逃进寿春，没有一个露头的。“出头者”是由“者”字构成的短语，指挺身而出的人，说“出头”可以，说“出头者”也可以，但是说“无出头”就不成话，“无”也不能解释成“无法”。总之，割弃了“者”字的“无出头”三字，在这里不成其为短语。

九、因版本之误而生误目

《大词典》编纂处要求引用古书时必须注意版本的校勘问题，并建议尽可能采用经过整理的新版本。^{〔6〕}但《大词典》中仍有承用旧本之误而忽视新版本的情况。例如：

[计考] 指古代州郡官员每年考察地方贤才，随上计吏贡举太常。《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今之计考，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参见“计偕”。（11卷14页）

“计考”是从误文中截取而成的词目，它的释义充其量也不过是郢书燕说。上引《三国志》的“考”，在1959年初版、后来又不断重印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中早已改成了“孝”。《资治通鉴》卷六九载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文：“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胡三省注：“计、孝，上计吏及孝廉也。”又卷七二载魏明帝太和六年蒋济有“岁选计、孝”之语，胡三省又注云：“计、孝，谓每岁上计及举孝廉也。”此外，“孝廉、计吏”并提，屡见于《后汉书·陆康传》等文献。事实表明，《三国志》旧本的错误应当校正。如果采用新版本，不

仅误目及误解可以避免,而且还可以建立“计孝”这样有实用价值的条目。

十、因引书可疑而生疑目

从孤立可疑的文献片段中截取的词目,如果没有足够的解读依据,就属于疑目。像前文提到的《三国志·蜀志·蒋琬传》,如果把其中“牛头”当作词目,也只能启人疑窦,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下面再举一例:

[通简] ①犹通刺。晋袁宏《后汉纪·献帝纪五》:“时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门通简宾客,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不见也。”(10卷947页)

“敕门通简宾客”包含着十分可疑的文字,把它解读为敕令守门者通刺宾客,在文法上讲不通,更何况汉末的“刺”是否可以称“简”又是个疑问。由此可见,在无法断定它是假目还是误目的情况下,这个词目只能存疑。^[7]

附注:

[1] 引自[捷]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主编的《词典学概论》15—1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 引自罗竹风《论语文词典的编纂工作》(1980.10),该文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 请参看徐复先生《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该文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4] 因不察异书同文而造成书证失序,其例不胜枚举,拟另文讨论。

[5] 在两种句读中,窃以为前者较为可取。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的句读也与前者相同。

[6] 请参看《〈汉语大词典〉引书格式》,汉语大词典编纂处1984年2月印。

[7] 窃以为“通简”有可能是误目。因为《后汉书·孔融传》云:“时河南尹李膺以

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作“敕门下简通宾客”,指命令门下有选择地通报来访者。袁宏《后汉纪》之文可能误倒。

(原载《文献》1998年第3期)

《汉语大词典》商补

在《〈汉语大词典〉书证商榷》^{〔1〕}一文中,笔者曾就《大词典》立目、释义和书证的时代提出订补的浅见;此文收入拙著《古文献研究丛稿》时虽有增修,但意犹未尽。本文除了在书证时代偏晚的问题上续补前文,还想从异书同文的弃取、引书的版本及标点符号等方面略呈管锥。由于《大词典》并非一次出齐,本文征引时均在引文后面的括号里注明卷数、页码;属于首次出现的卷数,则标明其出版年月。

一

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反映汉语的历史面貌和现时状况,是《大词典》收词立目的总方针。^{〔2〕}“共时”是横向的、断代的,“历时”是纵向的、各个断代的总和。要通过共时和历时的各个交叉点来了解汉语语言活动的全貌,就必须对先秦到现代的汉文文献作较为系统的调查,而首当其冲的调查重点,当然是文化史上历久弥新的常见书。无论从语言的研究价值还是从语言的利用价值来看,常见书中出现的语词,不管它是单音词抑或复音词,也不管它是基本词汇抑或特殊词汇,一般都应纳入大型辞书的取材范围之内。《大词典》收词广泛,书证丰富;经、史、子、集、宗教、科技,上至先秦典籍,下至现代著作,引书多达三千种以上。毋庸置疑,《大词典》收词取证的规模和质量是跨越前人的。下面我们要谈的,只